

城市记忆工程对档案馆工作的挑战

□ 阜矿集团清河门矿档案室 张云艳

“城市记忆工程”是基于现今社会全球化、现代化、多元化发展,城市作为社会的组成单元,在紧紧跟随社会前进的步伐快速发展的同时,追溯城市历史,以照片、影像等方式还原城市面貌,突出本城市特点,打造独具特色的城市形象的一项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的工程。

档案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原始记录,可以真实可靠的反应事物原貌,在档案中可以寻找到历史记忆,城市记忆建构的“重任”自然落到的各个城市的档案馆肩上。“档案在文化记忆、个人记忆和基因记忆的遗忘、构建、重构和恢复中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是寻找遗忘记忆和发现过去记忆事实真相的重要载体,……是保护过去、记录现在和联系未来的桥梁。把档案看成文件库的传统认识正在被记忆库和知识库所取代”。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曾在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开幕式中指出:“档案馆是保存人类记忆的各种表现形式,保存社会记忆、个人记忆的最权威的场所。”因此在城市记忆工程的建设中档案及档案馆的地位是其他任何事物任何部门无法取代的。

不可否认,各个城市的档案馆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对城市记忆工程的建设是卓有成效的,但在为成绩感到欣喜的同时,也体验到了此项工程的实施使得档案馆及档案工作人员面临新的挑战。

一、对档案馆社会形象的挑战

档案馆开展“城市记忆工程”首先面临的就是大众舆论对这项工程实施的合理性的质疑。一是对“城市记忆”的不理解。社会上产生了这样的一些疑问:“在当前中国城市地毯式的改造中,‘记忆’这个并不特别的词汇放在城市的变革中让人们感到异样、另类、不和谐和不解,城市难道不是愈新、愈方便、愈现代愈好吗?为什么需要记忆?记忆什么?有什么用?”另一方面是对“城市记忆工程”实施产生的“可能”的负面效力的质疑。2004年11月26日《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城市从此定格,也从此死去》的文章,作者在文中对武汉市武昌区启动的“城市记忆工程名录”工程进行了批判,作者称“这(城市记忆工程)真是个绝妙的主意!原来拆城的时候还总担心被人批评为‘破坏城

市的历史文化风貌’,有些缩手缩脚。现在‘历史文化风貌’既然已经被‘定格’到档案里了,也就再无所顾忌,尽可以放开手脚,大拆大建了。……如果我们把这种逻辑推而广之的话,可能会得出一些结论,比如,我们甚至可以对长城进行‘抢救性拍摄’,然后一拆了之。但这样做了以后,我们真的就不会再感到有一种‘难以弥补的缺憾’了吗?”

二、对传统档案馆资源建设的挑战

一方面是对传统档案资源建设范围的挑战。传统档案馆在对馆藏资源进行建设时注重的是对现时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收集保管。但是“城市记忆工程”的提出,使得档案馆需要对传统档案资源建设加以扩展。“城市记忆的组成要素包含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可见的有形环境,如地形地貌、森林、水力、公共建筑、住宅等。二是城市无形的文脉,特指那些没有具体物质形态,在历史上、文化艺术上有一定价值的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民间风俗、特色文化、历史传统、人文精神的总和。”“城市记忆”的内涵如此丰富,档案馆目前的馆藏显然并不能满足“城市记忆工程”的构建,因此对档案馆馆藏资源的建设要重新思考。收集时除了传统的纸本档案,包括纸质文件、照片、影像资料、声音资料等传统有形档案,还包括口述档案,“口述档案是为研究利用而对个人进行有计划的采访,通过采访历史文化或重要人物事件的知情人,被采访人直接口述形成的声像或文字材料。口述档案能填补历史空白和弥补档案断层。通过口述档案可以了解重要文件的产生背景、起草过程和重大历史事件的细节,查明一些众说纷纭的问题,补充‘文’中所缺。”

另一方面,是对传统档案馆资源建设方式的挑战。传统档案馆对档案的管理、开发利用主要是针对本馆馆藏,但是“城市记忆工程”的开展,使档案馆不得不改变这种资源建设方式,因为部分涉及“城市记忆”的档案会分散在民间,如个人、照相馆、私营企业等的手中。对于这部分档案,因其不受法律法规的限制,移交档案馆与否完全凭借个人意愿,所以档案人员在收集时,从内容和形式上都未必能够将档案完整的收集到。对于这部分未能到馆的档案,档案馆是否就要放

弃呢?如果不放弃应该怎么做呢?这是摆在档案馆面前需要正视的问题。

三、对档案馆公共服务职能的挑战

现在我国各级各类档案馆都致力于将本馆建设成为公共档案馆,以满足社会需求。在档案馆开展“城市记忆工程”时,需要考虑的不仅是将与本城市历史记忆有关的档案收集齐全,更重要的是将这部分档案在进行整理之后形成可以服务于公众的“城市记忆库”,让人们可以利用档案了解城市历史概况和涉及的有关政治、经济、人文等一系列信息,服务公众、满足公众认知城市历史文化的强烈需求。档案馆在实施“城市记忆工程”,实现“保护城市文化遗产、提升城市文化品位”这一目标的同时,还要让它服务政府决策机构,为城市发展研究、规划建设管理提供参考,为研究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提供丰富和多层次的历史信息资源。这就对档案馆的公共服务职能提出了更深层次的要求,档案馆不得不思考要采取怎样的措施才可以达到其公共服务职能的实现。

四、对档案工作人员观念的挑战

“城市记忆工程”的启动,使档案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档案人员也不得在观念上作出改变,加强并提高工作素质。

传统档案工作是根据档案法的规定,档案馆直接接收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按照国家规定,定期移交的档案。档案工作人员只需对这部分档案进行整理、鉴定、利用。但是“城市记忆工程”的提出,对传统档案工作者的观念有了新的要求,因为此时档案人员面对的不仅仅是档案,而是“城市记忆”,档案人员对于档案的任何处理,都会关系到“城市记忆”的建构问题。档案人员选择留下什么,那么后人就会看到什么。“当历史研究中只是对文件的有效性产生争议时,档案工作者还可以高枕无忧,但现在,社会记忆观已对档案工作的完整性和理论基础提出了质疑,它将导致对档案的重新认识和界定。”档案工作者在各种工作中不可避免地会掺进自己的价值,但是当档案成为“记忆”的时候,档案工作人员自身的价值取向就会影响到“记忆”的选择,档案工作人员是否能够承担起这样的重任,也是“城市记忆工程”对其的重要挑战。